

大哲人之一。

王国维

(1855—1927) 在文学、美学、史学、哲学、古文字学、考古学等方面都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，国学大师。

我闻道以作

二十世纪（1895—1930），初名学乘，字牧初，后易名绛，号太炎，后又改名炳麟，浙江吴县人。他出身于一个世博书香门第而后又遭败落的家庭，一生经历了戊戌维新改良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两个历史时期，走过了曲折的道路，是我国近代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著名的学者。

章太炎

(1863—1936)，字鹤卿，又字仲申，民友、子民，乳名阿培，号曾化名蔡振、周子尔，中国绍兴山阴人，原籍诸暨。

暨南大学

教育家、政治家。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，1924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，革新北大，开“学术”与“自由”之风，1924年至1930年，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。

李叔同

(1880—1942)，字默存，号槐聚，曾用笔名韦君，中国现代诗人、作家、音乐家、美术家、戏剧家，是“诗书画印”四绝的一代奇才。

李公穆

(1895—1950)，字宾四，江苏无锡人。中国现代历史学家、国学大师。

季刚

(1876—1950)，字孟真，山东聊城人。历史学家、文学家、哲学家。原名嗣座。

胡明正道

(1891—1950)，原名嗣座，诗人、历史学家、文学家、哲学家。山东聊城人。

陈鹤琴

(1892—1982)，字默存，号槐聚，曾用笔名韦君，中国现代诗人、作家、音乐家、美术家、戏剧家，是“诗书画印”四绝的一代奇才。

朱自清

(1898—1948)，字佩弦，号秋实，江苏扬州人。中国现代散文家、诗人、学者、民主战士。

叶圣陶

(1894—1988)，原名绍钧，字秉臣，后改名圣陶，江苏苏州人。中国现代作家、教育家、文学出版家、翻译家、童话作家。

丰子恺

(1898—1975)，字仁凤，号子恺，浙江桐乡石门镇人。中国现代画家、散文家、文学出版家、翻译家、童话作家。

胡适

(1891—1962)，字适之，安徽绩溪人。中国现代学者、文学家、历史学家、哲学家、古文字学家、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。

陈鹤琴

(1892—1982)，字默存，号槐聚，曾用笔名韦君，中国现代诗人、作家、音乐家、美术家、戏剧家，是“诗书画印”四绝的一代奇才。

朱自清

(1898—1948)，字佩弦，号秋实，江苏扬州人。中国现代散文家、诗人、学者、民主战士。

丰子恺

(1898—1975)，字仁凤，号子恺，浙江桐乡石门镇人。中国现代画家、散文家、文学出版家、翻译家、童话作家。

胡适

(1891—1962)，字适之，安徽绩溪人。中国现代学者、文学家、历史学家、哲学家、古文字学家、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。

陈鹤琴

(1892—1982)，字默存，号槐聚，曾用笔名韦君，中国现代诗人、作家、音乐家、美术家、戏剧家，是“诗书画印”四绝的一代奇才。

朱自清

(1898—1948)，字佩弦，号秋实，江苏扬州人。中国现代散文家、诗人、学者、民主战士。

丰子恺

(1898—1975)，字仁凤，号子恺，浙江桐乡石门镇人。中国现代画家、散文家、文学出版家、翻译家、童话作家。

胡适

(1891—1962)，字适之，安徽绩溪人。中国现代学者、文学家、历史学家、哲学家、古文字学家、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。

陈鹤琴

(1892—1982)，字默存，号槐聚，曾用笔名韦君，中国现代诗人、作家、音乐家、美术家、戏剧家，是“诗书画印”四绝的一代奇才。

朱自清

(1898—1948)，字佩弦，号秋实，江苏扬州人。中国现代散文家、诗人、学者、民主战士。

在文学、美学、史学、哲学、古文字学、考古学等方面都成就卓著的学术巨子，国学大师。我闻道以作

二十世纪（1895—1930），初名学乘，字牧初，后易名绛，号太炎，后又改名炳麟，浙江吴县人。他出身于一个世博书香门第而后又遭败落的家庭，一生经历了戊戌维新改良运动和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两个历史时期，走过了曲折的道路，是我国近代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著名的学者。

章太炎

(1863—1936)，字鹤卿，又字仲申，民友、子民，乳名阿培，号曾化名蔡振、周子尔，中国绍兴山阴人，原籍诸暨。

暨南大学

教育家、政治家。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，1924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，革新北大，开“学术”与“自由”之风，1924年至1930年，蔡元培同时兼任中法大学校长。

李叔同

(1880—1942)，字默存，号槐聚，曾用笔名韦君，中国现代诗人、作家、音乐家、美术家、戏剧家，是“诗书画印”四绝的一代奇才。

胡明正道

(1891—1950)，原名嗣座，诗人、历史学家、文学家、哲学家。山东聊城人。

陈鹤琴

(1892—1982)，字默存，号槐聚，曾用笔名韦君，中国现代诗人、作家、音乐家、美术家、戏剧家，是“诗书画印”四绝的一代奇才。

朱自清

(1898—1948)，字佩弦，号秋实，江苏扬州人。中国现代散文家、诗人、学者、民主战士。

丰子恺

(1898—1975)，字仁凤，号子恺，浙江桐乡石门镇人。中国现代画家、散文家、文学出版家、翻译家、童话作家。

胡适

(1891—1962)，字适之，安徽绩溪人。中国现代学者、文学家、历史学家、哲学家、古文字学家、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。

陈鹤琴

(1892—1982)，字默存，号槐聚，曾用笔名韦君，中国现代诗人、作家、音乐家、美术家、戏剧家，是“诗书画印”四绝的一代奇才。

朱自清

(1898—1948)，字佩弦，号秋实，江苏扬州人。中国现代散文家、诗人、学者、民主战士。

丰子恺

(1898—1975)，字仁凤，号子恺，浙江桐乡石门镇人。中国现代画家、散文家、文学出版家、翻译家、童话作家。

胡适

(1891—1962)，字适之，安徽绩溪人。中国现代学者、文学家、历史学家、哲学家、古文字学家、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。

陈鹤琴

(1892—1982)，字默存，号槐聚，曾用笔名韦君，中国现代诗人、作家、音乐家、美术家、戏剧家，是“诗书画印”四绝的一代奇才。

朱自清

(1898—1948)，字佩弦，号秋实，江苏扬州人。中国现代散文家、诗人、学者、民主战士。

丰子恺

(1898—1975)，字仁凤，号子恺，浙江桐乡石门镇人。中国现代画家、散文家、文学出版家、翻译家、童话作家。

胡适

(1891—1962)，字适之，安徽绩溪人。中国现代学者、文学家、历史学家、哲学家、古文字学家、新文化运动的代表人物。

陈鹤琴

(1892—1982)，字默存，号槐聚，曾用笔名韦君，中国现代诗人、作家、音乐家、美术家、戏剧家，是“诗书画印”四绝的一代奇才。

朱自清

(1898—1948)，字佩弦，号秋实，江苏扬州人。中国现代散文家、诗人、学者、民主战士。

丰子恺

(1898—1975)

熊得山 中国社会史论

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人生领袖之一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

五四运动学生领袖之一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

毕业生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之

近现代“史学四大家”之一，傅斯年在

人生领袖之一，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之



熊得山 中国社会史论



吉林人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熊得山中国社会史论 / 熊得山著.
长春 : 吉林人民出版社, 2012.1
(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)
ISBN 978-7-206-08284-9

I. ①熊…
II. ①熊…
III. ①社会发展史—研究—中国
IV. ①K207

中国版本图书馆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266225号

熊得山中国社会史论

著 者:熊得山

责任编辑:隋 军

制 作:吉林人民出版社图文设计印务中心

吉林人民出版社出版 发行(长春市人民大街7548号 邮政编码:130022)

印 刷:北京嘉业印刷厂

开 本:710mm×1000mm 1/16

印 张:20 字 数:280千字

标准书号:ISBN 978-7-206-08284-9

版 次:2013年3月第1版 印 次:2013年3月第1次印刷

定 价:35.00 元

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,影响阅读,请与出版社联系调换。

| 出版说明 |

一、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，旨在为读者提供20世纪二三十年代以来的中国学术精品。当时，学问家经历了新文化运动，西学东渐，学术革新；因时应势而现出版高峰，大师名家之作数量激增，质量上乘，对此时及后世的中国学术发展与演进均产生了巨大的影响。

二、本丛书精选此时大师名家之有关学术文化经典著作，以期对20世纪以来的中国学术文化做一系统整理。

三、丛书所收书目，虽各自早有出版，但零散而不成规模。此次结集，欲为推动中华文化之大发展、大繁荣尽出版人绵薄之力，成一民族文化珍品，为后代留存传之久远的鸿篇巨作。

四、为丛书系列之计，故以史学、国学、文学、一般学术著作之顺序编排。

1. 单种书文字量过少的著作，寻二三种内容相近，或作者为同一名家者，则合成一册，字数以30万字为限；

2. 单种书文字量超过50万字的著作，则分为上、下两册；

3. 单种书文字量超过100万字的著作，则分为上、中、下三册。

五、所收著作，版本不一；流布之中，文字错讹；择其善本，一一折校。现虽为通行横排简体，然尽量保持二三十年代原貌。

1. 人名、地名、异体、通假，仍从原书繁体；

2. 标点符号，从作者习惯，非排版差误者不予改动；
3. “的”，“底”一类文字之分，均从原书；
4. 遇原书字句有疑问者，非有根据不予更改，力求保持原貌。

“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”丛书，工程浩大、环节繁多，编辑、校对、照排、印制人员虽勉力为之然错漏不免，还望方家谅解之余不吝指正。

《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》编委会

主 编：

胡维革（吉林东北亚出版传媒集团总经理
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）

编 委：

赵 毅（辽宁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）
李书源（吉林大学文史学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）
程舒伟（东北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）
张昭军（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，博士生导师）
刘信君（吉林省社会科学院历史所研究员，博士生导师）

执行编委：

杨九屹（吉林人民出版社 编审）

总序

：

在几十年学习和研究中国近现代史的过程中，我一直对中国近现代的思想文化学术史颇感兴趣。尤其是在1995年至1996年我和东北师范大学历史系知名教授杜文君老师一起撰著《中国现代文化志》一书时，更是对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学术史进行了认真的梳理和研究。由此，我对中国近现代思想文化学术史有了一个大致的了解，尤其是那些文化泰斗、学术大师、扛鼎巨著、思想流派、异说纷争等，更令我铭刻在心，萦绕于怀。直到今天，每每回想起那段英英厉厉、千唱万和的历史，仍然是激动不已。

从1912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，是中国历史上由旧民主主义革命转变为新民主主义革命，并逐步取得革命胜利的时期。前后两次历史性的开国，前者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，后者标志“中国人民站起来了”。其间38年，是中国社会逐步实现由旧到新的转变时期，与该时期社会经济、政治的变革相适应，中国文化也在古今中西文化的冲突、反思、融合中变革着、发展着：社会文化的结构和内容在更新，西方文化被大量引进，中国传统文化也适应时代变革而被重新弘扬；一些原有学科的内容、体系在变革，许多新的部门文化纷纷兴起；出版了近十万种图书和无以计数的出版物，其中有不少革故鼎新、出类拔萃之作；中等以上学校培养了近五百万名学生，产生了一大批享誉海内外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哲学家、文学家、史学家、经济学家、教育家、科学

家，等等。这一时期在文化上取得了卓越的成就，尤其是“自从中国人学会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后，中国人在精神上就由被动转入主动。从这时起，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，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時代应当完结了”。

现代中国社会的经济和政治，是现代思想文化的源头。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当时中国的根本国情，制约着现代中国文化的基本主题、结构、性质、内容和特征。“没有资本主义经济，没有资产阶级、小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，没有这些阶级的政治力量，所谓新的观念形态，所谓新文化，是无从发生的。”但是从思想文化的相对独立性的角度来考察，中国现代文化是从古代的、近代的文化发展演变而来的。中国传统文化基本精神的演变，近代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，社会文化结构的变化，以及知识分子群体的历史走向等，都对现代中国文化的发生、发展有重要的影响。

纵观20世纪初年至1949年中国文化的发展历史，一般以五四运动为界分为两个不同的历史时期。在“五四”以前，中国文化的基本状况是，由甲午战争后起始的资产阶级文化运动已经开展起来，资产阶级新的文化体系逐渐形成，进化论、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思想成为新文化各个领域的指导思想，而新文化领域各部门也都为宣传民主、自由、平等服务。这时，文化战线上主要是资产阶级新文化与封建主义旧文化的斗争，学校与科举之争、新学与旧学之争、西学与中学之争都带有这种性质。资产阶级在领导文化变革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，并为中国培养了一大批能够站在时代前列、代表中华民族“讲话”、“呐喊”的思想家。可是，他们无力战胜帝国主义文化和中国封建文化的反动同盟：中国资产阶级文化革命同其政治革命一样，始终未能彻底完成。“五四”以后，由于国际国内形势的变化，由于马克思主义的广泛传播和中国无产阶级及其政党登上政治舞台，中国文化格局发生了变化，以无产阶级共产主义的文化思想为

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，联合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作为同盟军，向着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展开了英勇进攻。

其基本态势是：其一，“五四”以后的30年，是中国社会的剧烈变革时期，是新民主主义革命逐步取得胜利的时期，与此相应，这个时期的中国文化仍围绕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主题，以传播、应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主潮，以介绍和品评西方文化、重释和阐扬中国传统文化为重要内容，并以文化为武器来推动社会改革、人民革命和民族解放为根本目的。其主要成就，不仅表现在文化各领域、各门学科的变革与发展上，而且表现在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、应用以及弘扬中国优秀文化传统上。其二，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界出现了派别林立论战迭起的复杂局面。其中影响较大的论争有：东西文化之争、马克思主义与反马克思主义论争、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和关于中国文化出路的论争等，这是当时多种社会经济与复杂阶级关系、民族矛盾在文化形态上的反映，也是古今中西文化之争与多种思想源流汇集于中国社会的必然表现。其三，就文化的主要类型及其发展趋势看：无产阶级领导的新民主主义文化，代表着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；资产阶级民主主义文化，作为新文化营垒的一员，继续发挥反帝反封建、推进社会前进的作用；帝国主义文化和封建主义文化虽然占据统治地位，但是日薄西山，气息奄奄。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，在思想文化上是马克思列宁主义、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，也是革命民主主义思想的伟大胜利，是帝国主义奴化思想和封建旧文化在中国的失败和破产。这是一个总的发展趋势，而在不同的历史阶段，中国文化的发展和演变各有其不同的历史特点。

具体到各个学科，几乎每个学科都有一批学术大家在辛勤耕耘，都有一批学术著作相继面世。从某种意义上说，中国具有现代意义的、门类齐全的学科体系正是在这一时期建构起来的。例如在历史学学科，1939年开明书店出版了周谷诚的《中国通史》，1940年开明书店出版了吕思勉的

《中国通史》，1949年三联书店出版了吕振羽的《简明中国通史》，1948年新知识书局出版了侯外庐的《中国古代社会史》，1949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周谷诚的《世界通史》，1936年南京文化印刷社出版了吕振羽的《殷周时代的中国社会》，194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李源澄的《秦汉史》，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王钟麒的《三国史略》，1948年开明书店出版了吕思勉的《两晋南北朝史》，194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陈寅恪的《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》，1946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金毓黻的《宋辽金史》，1947年上海中国文化服务社出版了孟森的《清史讲义》，1947年新华晋绥分店出版了范文澜的《中国近代史》，1937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罗尔纲的《太平天国史纲》，等等。这些学术巨匠和学术巨作，使中国现代意义上的历史学学科正式建立起来了。其他学科如哲学、文学、教育学、民俗学、法学、图书馆学、博物馆学、考古学等，也是如此。学术史是全息的。后来者应该探源开流，继往创新，把我国的学术研究推向一个更高的层次。

大概正是基于上述原因，我组织同仁历时数载，编辑出版了这套《中国学术文化名著文库》，以飨读者。

是为序。

胡维弟

2011年12月15日
于长春百汇街寓所

中国社会发展迟滞原因

(代序)

李达^①

本文所说的中国社会，是指从西周初年到清代鸦片战争止这一时期的社会说的。西周初年，相当于公历纪元前一一二二年，鸦片战争，发生于一八四〇年，其间的距离是二千九百六十二年。这长约三千年之久的中国社会，属于封建社会的阶段，这是近来研究中国社会史的人们所确认的。为什么中国社会在三千年的长期内停顿于封建阶段呢？西欧各国所经历的封建时期，不过八九百年，就都转进了现代社会的阶段。而中国社会却长期停顿于封建阶段，以至成为落后民族，变成了帝国主义侵略的对象。中国社会发展迟滞的原因究竟如何，这是本文所要说明的问题。

人们或许要问：在这三千年的长期中，中国社会究竟有没有进步呢？我的答复是：进步是有的。大体上说来，西周的领主经济，进到春秋时代，农业生产较前进步，手工业和商业也相当发达。特别是到了战国时代，铁制农具的应用比较普遍，灌溉施肥等农耕技术比较进步，农业生产力是向上了。一方面，由于手工业与商业的发达，土地成为买卖的对象，富农和商业资本家，凭着金钱与势力取得了大宗土地，形成了民间大地主的经济。另一方面，在学术思想上，周秦诸子，如儒家、墨家、法家、名

^① 李达（1890～1966），中共一大代表，建国后任武汉大学校长，曾与熊得山等办昆仑书店。本文发表时，作者曾有附志，说明拟将此文作为亡友熊得山遗著《中国社会经济史》代序。经整理者考证，李达所说遗著就是指这部尚未完成的书稿。——整理者

家、道家、阴阳家各派的学说，在中国学术史上，达到登峰造极的地位。

秦汉之际，血战数十年，“丁壮委道路，老弱填沟壑”，“民失作业，而大饥馑”。《汉书·食货志》所说：“天下初定，民亡盖藏，自天子不能具醇驷，而将相或乘牛车。”这表示着当时经济条件的气象。自是以后，地主经济代替了从前的领主经济，由于农耕技术的较前进步，重农政策的实行，水利事业的发达，经济比较战国时代更有进步。工业方面，如煮盐、冶铁、冶铜、纺织等比较发达，特别是纸的发明与制造，是值得大书特书的。商业方面，更见发展，商业资本家的势力很大。而且通西域、至欧洲的国际贸易，也在此时开始。这表示着汉代封建经济的进步。可是，在学术思想方面，由于汉武帝罢黜百家，独尊儒术，精神文化从此就始终停顿于儒家学说的范围，并没有新的成就了。

但自东汉末年“黄巾贼”的农民暴动之时起，社会陷于极度混乱的状态，其间经历三国、魏、晋、南北朝、隋以迄唐之统一，计共四百三十年之久。这四百三十年，差不多都是战乱的时期，民生凋敝，百物萧条，这可说是社会的停滞或倒退的时期。

唐代统一中国以后，天下太平，农业经济由复兴而趋于繁荣，如贞观时代之斗米三钱，可见当时农业生产力之发达。手工业方面，如矿业，有治银、治铜、冶铁、治锡等部门；如纺织业，有织布、织麻、织绸缎绫罗等部门；此外有窑业、纸业、糖业、酒业、染业、盐业、茶业，均极一时之盛。至于商业，国内水陆交通颇为便利，商品易于流通，都市相当繁荣。国际贸易也很发达，陆路通达西方土耳其、波斯、印度，设有市监，掌管蕃国贸易并课征关税；海路通达印度、锡兰、波斯、大食、阿拉伯等处，设有市舶司，掌管海上贸易并课征关税。从这些方面看，唐朝在极盛时代，封建经济发展到了很高的地步。可是盛唐时代封建经济的繁荣，自从藩镇割据之时起，中经五代十国以至宋之统一，差不多二百年之间，就逐渐消失，又显出了停滞、萧条的时期。

宋代统一中国以后，经过多年的休养生息，地主经济又复兴起来。工业方面，手工作坊及手工业行会，非常发达，在整个封建经济上，呈现出小康的景象。但是这种小康，至多也只继续了两百年，自从辽金元的游牧民族入侵，宋室南渡以后，社会的进步又停滞不前。元代以游牧民族统治中国，其文化是落后的，当然不能促进社会的前进。农业经济且杂有农奴制的成分，生产力当然没有进步。手工业方面，制造场的数目以及制品的种类，虽然很多，表面上好像很发达，而实际上那些制品是专供蒙古贵族消费之用，还不能说是社会经济的繁荣。所以元代整个社会经济没有什么发展。

明代工业颇为发达，例如开矿业、冶金业、染织业、陶瓷业等，其制造所以及制品的数目甚多。手工作坊与手工工场等，都是较大的规模，这好像和西欧产业革命以前的情形相像。特别是国外贸易，颇为繁盛。当十四世纪与十五世纪之时，中国货物多运销南洋一带，当时的南洋都是华人的势力。所以就明代当时的社会经济情形来看，手工工场的相当发达、商品流通范围的扩大、货币经济的发达、资本之原始的蓄积等等，好像比较那个时期的欧洲还走到前面。可是这种经济的繁荣不能长久保持，明代的封建机构，忽然采取锁国主义（十六世纪初），窒塞本国工商业之发达。自后农民暴动接踵而起，社会经济又复由繁荣而入于萧条，到清朝统治中国之时，更趋于停滞。

清代自康熙年间起，至鸦片战争之时止，其间农业经济复呈旧观，农耕技术虽未有若何改进，而耕地面积却显著增加了。在这一点，显示着农业生产的增多。工业方面，手工作坊及手工工场在沿海一带，颇为发达。商业方面，大都沿袭明制，采重农抑商主义，对于国外，最初仍严守闭关主义，往后始设江浙闽鄂四关，实行有限制的国际贸易。所以沿海各重要都市的工场手工业都趋于发达，资本主义已经长出了嫩芽来。可是这种自发的资本主义的嫩芽出现得太迟一点，终于因为受了壮大的资本主义的暴

力的压迫而横被摧残了。

以上是三千年间封建社会发达过程的缩写。这三千年间社会的进步，是很明显的。可是我们所注意的，并不是这长期的社会有无进步的问题，而是这社会为什么长期的停顿于封建阶段的问题。这就是我所要说明的中国社会发达迟滞的原因。

中国社会发达迟滞的原因，据我的研究，可分为下列八种：

第一，战乱之频繁

战乱是社会的或国际的利害冲突不可调和的必然的结果，又是国外掠夺的强有力手段。封建时代，领主们为开拓领土或保全领土而起的战争，农民们为反抗封建统治而起的革命的战乱，历史上记载得很多。有人说，一部中国史，是人类相斫史，这话有几分是正确的。春秋时代不过二百四十二年，而列国间大的战争便有二百多次，不知牺牲了多少人命？战国时代，战争的技术进步，战争的规模扩大，杀人的数字更多，每次战争，斩首数万到数十万不等。秦代以后，所谓统一的局面有秦、汉、晋、隋、唐、宋、元、明、清九朝，从一个朝代到另一个朝代，总要经过或久或暂的群雄割据、战乱相寻的过渡期。这种过渡期，是人民生命财产遭受空前浩劫的时期。关于人民在战乱中死亡和减少的情形，可从下列统计表中看出来。

周成王时	13 714 923 人
秦时	10 000 000 人
西汉平帝时	59 594 978 人
东汉初	21 007 820 人
东汉桓帝时	56 486 856 人

晋初	6 163 863 人
隋末	46 019 956 人
唐太宗时	3 000 000 人
唐玄宗时	52 909 319 人
宋初	19 930 320 人
元世祖时	60 491 230 人
明洪武三年	59 873 305 人
明万历六年	60 691 856 人
清顺治十八年	21 068 609 人

上表主要是根据《文献通考》作成，虽不是怎样精细可靠的统计，却足以说明封建的战乱引起人民大量死亡的真相。在大体上，我们可以说：封建的朝代之更替，总经过或久或暂的战乱时期，在这种时期中，兵士膏血原野，人民死于兵火（如黄巢杀人八百万，张献忠屠尽四川人），这是人口方面的大剿灭，也就是劳动力的大损害。其次是城乡化为废墟，田园鞠为茂草，牲畜全被屠杀，这是人民物财方面的牺牲，也就是生产手段的大破坏。劳动力与生产手段既遭受那么重大的破坏，生产力当不能发展，反而要倒退了。

第二，封建的力役

封建时代的劳动力，在战时固然要遭受大毁坏，即在平时也要遭逢大量的消耗。这就是封建的力役。原来所谓“力役之征”，从周代起，是与所谓“粟米之征”、“布缕之征”并列的。这“力役之征”，名称不一，大致可以分为下列六项。

其一是兵役。《诗经》“我徂东山”篇，是说明盛周时代人民当兵的

苦况的。战国时代，各国兵员动辄数十万，每次战争的残杀，动辄数十万人，可想当时兵役规模之大。秦汉以后，兵役的制度不一。大体上说来，平时的兵役还有一定的制度，一到战时，兵役制即不适用，可以当兵的男子都得当兵。无论战争的胜负如何，服兵役的人民都要暴骨于原野。争城争地的战争，不知牺牲了多少服兵役的人民，摧毁了多少的劳动生产力。

其二是经营宫室的力役。封建阶级营造宫室，全都征用民夫。周代自文王经营台囿起，以次及于诸侯卿大夫，一切官室的营造，都由人民服役。自秦以至于清，此项力役，变本加厉。除了极少数所谓施行“仁政”的帝王，知道“使民以时”，不于农忙之际征用民力大兴土木而外，其余绝大多数帝王，大都使民不以时，甚至役死人民的事实，几于史不绝书。最显著的例子，如秦始皇之筑阿房宫与骊山陵寝，隋文帝之筑仁寿宫，隋炀帝之筑迷楼，役死民夫无虑数十万人，不知滥耗了多少劳动力？

其三是修筑城阙的力役。封建阶级为了保全领土，在卫国卫民的美名下，征集民夫以修筑城阙，历史上实例甚多。最残酷的实例，如秦始皇之筑万里长城与隋炀帝之续筑万里长城，人民因而死亡和倾家荡产者，不可胜数，正不知滥耗了多少劳动力与生产手段。

其四是治水工程的力役。治水工程，是中国史上最伟大的公共事业之一。中国农业之发达，大有赖于此类治水灌溉的公共事业，原是不可否认的事实。但这种事业的成就，却滥耗了无数人力与财力，办理治水工程的官衙，草菅民命，榨取民财，这是治水工程的黑暗面。特别是隋炀帝的开凿运河，本是供巡幸的娱乐之用（虽然这运河的利益很大），而当时筑河的人民横死的惨状，是众所周知的历史的事实。

其五是制造官家用品的力役。《诗经》所记的“为公子裳”，“为公子裘”，是说明西周人民为封建阶级制造服物用品的事实的。一般的说来，封建阶级所需要的服物用品，都设立工作场所，征用民工制造。随着统治者奢侈程度的不同，被征民工的数目也不同。例如唐宋元明的官工业，都

是制造皇家服物用品的，所征用的民工人数，由数万以至于数十万不等。这类民工至多只能从皇家领取少量衣食费用，工资是无足道的。这类官工业，虽然规模很大，但纯属消费的生产，反而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达。

其六是各种杂差。凡属管理官家物产、督收赋税、追捕盗贼、运送皇饷与贡物、驿送公文及其他一应杂差，都由人民担负。这类杂差，不但消耗人民生产的劳动力，甚至迫使当差者丧失其生命财产。例如宋代的差役，“按乡户等第差充”，而实际纯属直接生产者的农民担负。他们至少要服役三年，直到破尽家业，方得解除差役。

以上是封建的力役阻碍生产力发展的说明。

第三，封建的剥削

周初对人民实物的征课，如孟子所说，“有粟米之征，有布缕之征”。此外还有“屋粟”、“里布”与“夫家”，“屋粟”即是所谓“夫三为屋，田不耕者，罚以一屋三家之税”。“里布”即是所谓“宅不毛者，罚以一里二十五家之布”。“夫家”即是所谓“无职业者，使出一夫百亩之税”。剥削的名称，历代不同，税率亦异。大体上说来，封建的剥削可分为田赋与人身税两类，而田赋是主要的剥削形态。周初的税率是所谓“什一税”，即按照农民的所得，值什抽一。春秋时代，税率加重，值什抽二，更进一步是值什抽六。如鲁哀公所说“二吾犹不足”，晏子所说“民参其力，二入于公而衣食其一”，即是实例。战国时代，剥削更是加重，孟子所说“今之诸侯，取之于民，犹御也”，这简直是说，封建的剥削，等于强抢。从战国末年以迄于秦之统一，土地可以买卖，民间地主出现，富者田连阡陌，贫者土无立锥。从此，土无立锥的农民，佃种地主的土地，要把收获物的一半缴纳于地主。如《史记》所说“耕豪民之田见税什伍”是。封建的国家，按照田地的亩数，征收定额田赋。这种田赋，表面上由地主完